

# 作为世界发展典范的中国及其面临的问题<sup>①</sup>

[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哈佛大学 剑桥城 02138)

**摘要:** 中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却实现了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印度的经济改革也赶不上中国的步伐。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快速的市场化改革,成为一个经济发展方面重要的范例。我们不能单纯从历史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发展未来会有瓶颈。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温和,增长速度相对放缓,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是问题,消费率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 国际援助; 国际贸易; 领导作用; 生育率; 人口大国;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7)06-0103-04

我认为,此时是中国思考她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时间点,G20峰会将于2016年9月初在中国杭州召开是原因之一。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中国在建设国际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会有很多讨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在这一很短的时间内,显然无法进行充分的讨论。但我想可以从援助和贸易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在国际援助上有她所关心的问题,这很正常。在国际贸易方面,具体来说在如何开发、如何更好地利用贸易机会、将名声不佳的全球化转变为积极变革的动力等方面,中国是一个领导者。

各方面期待中国为G20提供一个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始于2009年的英国,英国所起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导作用,当时,我们确实需要那种领导作用。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全球经济正处于自由落体式下行状态。在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干涉下,2009年4月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世界经济下滑。

现在世界已经改变了,一些欧洲的思维模式不太适用于中国。例如,欧洲经济体一直痴迷于削减债务与GDP的比率。当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达到70%时,戈登·布朗被指责抵押了整个英国的未来。人们不应该忘记,当英国开始建设福利国家和国家卫生服务体系时,她的债务与GDP的比率是225%,因而70%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一个极大的区别是当时的欧洲正在增长之中,它有一个增长哲学。欧洲有信心可以降低这个比率。当哈罗德·麦克米伦告诉英国人“你从来没有生活得这么好”的时候,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高于130%。现在中国的比例也像这样——像英国负债220%的时候,不过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中国也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问题。这与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所关心的事不同。拉詹一直在考虑银行体系获得充足资本的问题。这是一个不

<sup>①</sup> 本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于2016年2月25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构建包容高效的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体系”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主旨演讲。阿马蒂亚·森的发言首先由Kasha Kelkar根据录音整理成英文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唐琦把英文演讲稿译成中文,最后北京大学刘民权教授、夏庆杰教授对翻译稿进行了校对并为本文加了标题。

收稿日期:2016-02-26; 修订日期:2017-04-26

作者简介:阿马蒂亚·森(1933—),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哲学教授,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大学教授,从事经济发展、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等研究。

同的问题。公共债务问题是一个不同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公共债务在很大程度上与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关。我认为,在许多方面,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公共服务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教育、医疗等领域)来驾驭经济增长。

世界能从中国发挥领导作用获得的最大收益就是向中国学习。中国提供了许多经验,但实际上没有被注意到。有时这些经验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得到认可,所以我们应该强调其经验。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毕竟,中国是历史上“地处中央的国家”。我来自印度,这是一个西方的王国,虽然不是主要的事情发生地,但是主要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里!正如中国道教领袖曾提到的“一个像佛陀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怎能在西方王国出生?如果一个伟大的想法出现,它应该出生在中国。”这是大家需要正视的历史,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中国一直建立在教育和启蒙的基础之上。在某些方面,关于佛的问题是非常模糊的。因为佛陀也是启蒙人物,虽然来自西方王国,但他被纳入中国的儒释道体系之中。

现在,如果你看看中国已经发生的变化,开始时在采纳市场经济上曾经犹豫——毛泽东虽然相信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但不相信市场经济——这也给后来人留下了改革的机会,即1979年的经济改革。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卫生部门的作用被低估了,虽然现在已不再是这样,不过好在教育的作用从未被低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开始了显著的工业化进程。然而,这一进程无疑是由经过学校教育的有技能的劳动力驱动的。我认为对这一点必须充分认识,只有如此,才能知道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世界变化很快,中国人突然能够生产世界上的任何商品,这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这是一种技能形成。如果当你们有基本的技能、受过基本的教育,那么当你们面临挑战时,就可以解决它。随意挑选一种商品,中国人都可以制造。中国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他们可以阅读和学习,并了解什么是质量控制。这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

他一些国家还没有实现过。

日本也属于这一类。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重点就是发展教育。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和日本这方面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理解中国这个“中央王国”的一种方式观察公元604年的日本人。那时日本人在圣德太子(日本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的摄政王)的统治下,宣布第17条“宪法”,其中要求任何决定都要通过咨询,这是(英国)大宪章出台600年前的事情了。他还有一个抱怨是:由于佛教是通过韩国来到日本的,大量的中国佛教文献在日本是未知的。所以虽然他因为第17条“宪法”而被铭记,但他还应该被记住的是他组织了对中国佛教文献的最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因为存在这样的联系,所以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教育扩张中也有很多中国的痕迹。

从“文革”走出来后,中国就朝现在这个方向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首先在农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明显,在中国,教育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工业变革的推动力。我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工业革命与中国的教育发展成就联系起来,就不能理解中国的成功。虽然这不是关于印度的讨论,但是如果说印度发展思想中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下面这一点:在拥有大量受到良好教育和身体健康的劳动力群体之前,印度实现工业化是不现实的。不管是外表如何,可以生产的商品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印度人在全球贸易中做得也非常好:比如制药、信息技术和汽车零部件。但是不像中国,你可以给一个商品,要求某个工厂生产,几年内在中国可以做到批量生产。一方面,巴西进展得相当缓慢,墨西哥学得也相当缓慢,但中国却可以大规模地做好产品;另一方面,教育本身也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使更多的人识字和社会更加开化;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也将得到保留。从1979—2002年,尽管中国的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但是如果不是这一期间的中国卫生健康系统的不健全,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会更显著。

现在我知道,中国人都会对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做一些批评。如果没有这些批评,中国就不会很好地秉承她的传统。但是这背后的大背景就

是,在中国发生的学校教育变革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发生过。学校教育影响了工业生产、社会生活、预期寿命和其他一切事情。学校教育也影响着出生率,《纽约时报》曾提到,把荣誉归于一孩政策是一个错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家庭的生育率高于5。但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的十年中,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从5下降到3以下。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变化?显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所致,因为它还没有实施。其实根本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受到教育和就业影响。其内在的联系是这样的:过多的怀孕和照看孩子对年轻女性而言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劳动,所以任何增加年轻女性家庭决策权的机会都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这种现象在跨国比较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印度做了详细的研究,比较了超过450个地区的生育率变化状况,结论也是如此。只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生育率下降:女性所受教育和女性的有报酬的就业。

中国女性生育率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就已经大幅度下降。当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时,中国女性的生育率已经是2.8,现在是1.7。在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实施前(1980年)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尽管“文革”带来一些灾害,但在此期间中国的基础教育方面却出现了一个跃进。

印度的一些邦已经降低了生育率,我所在的西孟加拉邦是1.6,这个比率稍低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较低的生育率都与女性的教育和有报酬的就业直接相关。

那么,现在这些问题是什么呢?由于我被告知不能说得太长,必须为提问留出时间,所以不能浪费时间。请让我说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我不相信任何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一个国家会突然卡在那里,整个比喻是错误的。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很乐意谈论它并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不相信它。我不担心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问题。1995年时中国的GDP是整个世界GDP的2%,而2015年是12%。如果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慢下来,那将是惊人的。我并不认为消费

存在一个瓶颈的故事是真的。中国的消费一直在稳定增长,只是在相对于快速增长的收入来说,消费收入之比似乎正在下降。1983年以来,几乎每年我都会来中国。中国消费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我在任何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瓶颈问题;它肯定不是供给侧的瓶颈问题——任何商品,中国人都可以生产出来。这是一个经济调整的问题,它需要税收制度、财政政策、激励结构和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我认为可以使消费与收入的比率迅速上升。

接下来我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地以世界没有见过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发展。但是,中国能否将高收入转化为辅助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是中国如何用经济发展去促进社会取得进一步发展?我这里提出疑问。例如泰国比中国贫困得多,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7岁,泰国人则是78岁;中国婴儿死亡率是11,泰国是11;中国孕产妇死亡率是1.7,泰国是1.4。现在泰国遵循的教育政策与佛教有关系。奇怪的是,佛陀出生的印度是一个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忽视佛陀的国家。但是,我的问题是,中国结合良好的市场政策、对经济的良好理解,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经济上更富足了。但是为什么中国在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表现反而不如泰国?寻找答案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社会部门的影响力,但这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是否可以更多地利用现有的经济成就促进社会发展?

第二个问题很重要,并且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中国的生育率降低是因为中国女性。中国女性取得了其他国家女性无法实现的成功,但是对于男孩的偏好在中国为何仍然如此强烈?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怀男孩的概率明显高于女孩。30年前我花了些时间才从医学角度搞清楚了这个问题。粗略地说,怀孕时性别(男女)比例为108:100。但是他们出生的时候,性别比例却是105:100,或者是女孩与男孩比率是9.5。在德国、英国、美国及其他地方都是这个比率。这一比率在9.4~9.6之间波动,大约是9.5。在印度,这一比率是9.26,但是在中国却是8.47,这完全是由于

选择性堕胎所致。考虑到中国女性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成功,为什么中国异常的出生性别比例不成为一个问题?在印度或其他国家,人们通常说女性并不是如此被尊重的,他们不能像中国女性一样在生活中取得如此多的成功。毫无疑问,这里有一个文化问题。即使韩国的出生性别比率(9.09)也在印度以下。印度各地的出生比率也有差异,这很奇怪。如果你去东部和南部,阿萨姆邦、孟加拉邦、奥里萨邦、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这个比例是欧洲水平的,在9.4~9.5之间。如果再看看北部,克什米尔、哈里亚纳、旁遮普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和莫迪先生所在的古吉拉特邦,这些邦的出生性别比低得多,低于90,有时甚至低于中国的8.47。为什么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率与印度最落后的地区相似,而不是和印度的比较发达地区一致呢?为什么促使中国女性决定小家庭模式的同样理性思维却没有改变她们偏好男孩的生育模式呢?

关于中国出生性别比率较低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每次我来到北京大学都想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也了解了一些情况。希望下次我再来的

时候能够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不是一个惊喜测试,但它是一个留给北大的同仁们帮助解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亚洲都重要。尤其奇怪的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出生性别比率也都略低于欧洲。为什么?我们能观察到其中有文化因素,但中国在过去克服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障碍。为什么不能克服这个障碍呢?我给你们留下这些问题,而这个问题发生在一个已经取得伟大成就的国家里。在发展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得了与中国同样的成就。

中国在20国集团中的主要贡献是中国这么一个超级人口大国却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没有中国,印度的经济改革就不会发生。虽然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在前,但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人阻止不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之后,整个印度的议题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认为中国真的很重要。这两个问题对中国、对于世界也很重要,因为世界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很多。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房宏琳]

## China , the Role Mode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hallenges She Face

Amartya Sen

( *Harvard University , Cambridge 02138* )

**Abstract:** As the super populous country , China has realized rapi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dian economic reform cannot catch up with China. After experiencing fast marketization in the 1980s ,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odel in ter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could not say there is a bottleneck that the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encounter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t present ,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ather steady. Although economic growth slows down a bit , China's future economic growth is not a problem , an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consumption ratio to increas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Trade; Leadership; Fertility; Population

## On 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s of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 GPEDC ) Agenda

LI Xiao-yun , MA Jie-wen , WANG Yi-huan

(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 Beijing 100193* )

**Abstract:** The emerging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 GPEDC ) is regarded as an epitome of a polycentric structure within 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GPEDC agenda , analyze its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as well. In addition , this paper will propose some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to deal with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ucture properly. In response to the various chan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ucture , we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me certain agendas in the context of our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and related principles to dialogue with the so-called orthodox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governance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west. Moreover , we have been pursuing to reshape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governance system by increasing China's influen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gradually , in order to hold a proper position and statu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Key words:** GPEDC; Development Agenda; Development Assistance